

北方民族史论丛

陈育宁 汤晓芳

宁夏人民出版社



序

邱树森

育宁、晓芳伉俪多年来潜心研究我国北方诸民族的历史、文化、地理与现实，他们的研究成果，我们虽常见诸报刊，但仍难以窥知其全貌，现在宁夏人民出版社将他们的论文汇集成《北方民族史论丛》予以出版，这对民族史学界是一件好事，也是陈、汤二氏奉献给90年代的一份厚礼。

民族史是历史学中的重要门类。由于从事民族史研究需要历史学、民族学、语言学、历史地理学等多方面的知识，因而它又是一门综合性的边缘学科。我国是一个由几十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汉族和各个少数民族虽然社会发展的历程和文化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但都有悠久的历史。一部二十四史，从太史公修《史记》开始，对于少数民族的历史代有记载。但认真开展对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那是乾嘉以后的事。随着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西方殖民主义势力东来对中国边疆构成的威胁，西北史地之学逐渐兴起，于是出现了像钱大昕、

徐松、魏源、张穆等精于西北史地的大家。清末洪钧出使俄国，据域外史料纂成《元史译文证补》，中国学者始知国外竟有如此丰富史料，于是有柯绍忞、屠敬山重修元史之举，又涌现了王国维、陈援庵这样的大学者。本世纪30年代后，姚从吾、翁独健、韩儒林、王静如、马长寿等一批学者用先进的科学方法研究北方民族史成绩卓著。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我国的民族团结不断加强，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有了很大发展，民族史研究工作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40年来，已经培养了几批从事民族史研究的科学工作者，其中包括许多少数民族的学者。他们编写、整理了一批民族史、志和民族史资料；深入边疆，搜集、整理有关少数民族社会风俗、政治制度、经济状况、宗教文化等资料；发掘、发现了许多古代少数民族的遗址、墓葬和文物。这40年，是我国民族史研究空前繁荣的40年。民族史研究的开展，对于加强民族团结、弘扬民族文化，巩固和开发边疆，其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蒙古学、突厥学、西夏学等，作为北方民族学的各个分支，都是具有国际性的学问。欧美、日本等国长期以来十分重视对中国北方民族的研究。16世纪后期开始，西方传教士纷纷来华，他们曾将大量中国史书译成西方文字。18世纪以来，德基涅 (De Guignes)、多桑 (D'Ohsson)、俾丘林 (И.Б.Пнурич)、贝尔津 (И.Березин) 等，以及本世纪的巴托尔德 (В.Бартольд)、符拉基米尔佐夫 (Б.Владимирцов)、格鲁赛 (R.Grousset)、伯希和 (P.Pelliot) 等，都是研究我国北方民族史富有盛名的权威。日本则有那珂通世、箭

内亘等几代学者。在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设有专门研究机构，拥有大批专家，开展对中国北方各民族的深入研究，各种国际性的学术会议经常召开。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也曾召开过多次蒙古史等国际学术会议。由此可见，开展北方民族研究对于国际学术交流也是非常必要的。

育宁、晓芳伉俪6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他们风华正茂，准备走上工作岗位之际，“史无前例”的文革发动了。他们在辽阔的鄂尔多斯整整呆了10年。岁月艰难，却未蹉跎。勤劳、勇敢的蒙古族牧民，鄂尔多斯的山山水水，引起了他们对蒙古族历史的浓厚兴趣。工作之余，他们调查风情，考察地理，研究文献，积累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论丛》中的一组有关鄂尔多斯的论文，那么自如地说古道今，如果没有对鄂尔多斯的深厚感情和生活体验是无论如何写不出来的。其中如《鄂尔多斯地区沙漠化的形成和发展述论》，在详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运用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进行充分的论证分析，不仅对这一地区沙漠化形成的社会原因及历史演变作出了符合史实、脉络清晰的描述，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今天制定这一地区经济发展方针，提供了决策依据，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果。当陈、汤二氏跨入科研机构的大门后，他们对蒙古史和北方民族史的研究也随之入门，功底渐见扎实，认识逐步升华，科研成果不断问世。《论丛》收集的论文中，有一组关于史学理论及史学研究方法的文章，其中不乏深刻的见解和新颖的观点，反映了作者在史学研究领域向着更高层次的追求。

有道是“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伉俪二人

共同研究蒙古史、北方民族史，这在我国恐怕是不多见的了，我想把这本书比作他们学术上的比翼鸟、连理枝也许更加确切。

一九九〇年元月于贺兰山下

目 录

序.....	邱树森
我国古代农业文化与草原文化的形成及其交流.....	1
蒙古族族源研究的回顾及其新进展.....	16
蒙古与西夏关系略论.....	29
评李元昊在西夏建立过程中的作用.....	46
试论成吉思汗用兵西夏的战略意义.....	62
成吉思汗的葬地和陵园.....	74
成吉思汗陵寝迁移始末.....	90
论元朝文化的历史地位.....	103
喇嘛教与元代蒙古文化.....	116
近代内蒙古地区的“移民实边”及其影响.....	129
清末在蒙古地区的“新政”.....	143
清代喇嘛教在蒙古族地区的特权及其衰落.....	159
论近代蒙古地区喇嘛教的寺庙经济.....	170

哈拉浩特与外国探险家·····	184
鄂尔多斯地区民族关系的历史考察·····	198
论秦汉时期鄂尔多斯地区的经济开发·····	213
鄂尔多斯地区在西夏历史中的地位·····	225
明代蒙古之入居河套·····	237
近代内蒙古地区“独贵龙”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249
鄂尔多斯地区沙漠化的形成和发展述论·····	263
鄂尔多斯蒙古族的祭祀活动·····	288
鄂尔多斯蒙古族的饮食习俗·····	304
国外研究鄂尔多斯蒙古的几个问题·····	322
鄂尔多斯地区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341
翁独健对民族史研究理论的贡献·····	353
关于我国民族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366
我国蒙古史研究的新进展·····	371
谈谈历史学的综合研究问题·····	380
史学研究方法改革刍议·····	392
史学研究方法的继承与改革·····	399
史学的社会功能与史学家的观念变革·····	413
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一个范例·····	419

我国古代农业文化与草原文化的形成 及其交流

本文所讨论的我国古代的文化问题，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即包括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我国这样一个民族众多、地域辽阔、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地域性和时代性之特点，这些特点互相交叉与融合，呈现出一种多元结构。对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碰撞、交流和融合的比较研究，是我们从整体上认识中国古代文化及其发展轨迹的重要途径。

一、自然地理条件是形成南北 两种文化的前提性因素

人类历史和文化的发展，要受到多种社会条件（尤其是生产方式）的制约，而自然地理条件又为生产方式的选择提供了物质材料，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类文化的发展趋向，而且越是在生产力低下、对自然依附性越强的古代，这种影响力所

占的比重就越大。因此，人类文化的发展是以自然为基础的。自然地理环境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形成某种类型的前提性因素。

在我国大陆内部，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及随之而形成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不同，最初的文化形态可分为草原型和农业型两种。从地域分布来看，两种文化虽有交叉，但总体上两者还是较分明的：大兴安岭以西，天山以东，燕山、秦岭、祁连山、阿尔金山、昆仑山以北的地区及青藏高原为草原型文化，其它地区为农业型文化。这两种文化殖生的自然地理环境不同，其特性和发展的态势亦不同。

我国古代北方，阴山以北、大兴安岭以西（俗称漠北），多戈壁、大山，冬季长，常有大风雪；夏季短，昼夜温差大；春秋干旱少雨。每年有一半以上时间因大陆高压笼罩，为世界上最强大之蒙古高压中心，是亚洲季风区冬季寒潮的源地之一，无霜期短，降水量少。地表为粗砂、砾石，只有稀疏杂草生长。阴山以南，燕山、祁连山以北地区（俗称漠南），地表植被比漠北略好，但受蒙古气压影响，气候寒冷，不宜农作物的生长。以上地区的人们受自然地理环境的制约，围绕畜牧业而创造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明，我们称这种文化为草原文化。

自古以来，阴山南北的草原地区是我国北方游牧民族的文化摇篮之一。目前发现的分布密集的阴山岩画，栩栩如生地向我们展现了古代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风俗习惯、艺术审美及原始信仰，是形象而真实地反映古代北方游牧民族草原文化的艺术长廊。在丰富多彩的岩画造型中，有各种野生动物、家畜，有个人行猎和集体围猎的狩猎场面，有部落战争图，及反映

宇宙崇拜的日月星辰图，游牧人的居室穹庐毡帐、敬祭神祇的人牲物性和各种记事符号等。这些岩画富有浓郁的草原游牧生活气息，既展示了游牧民族赖以生存的水草丰美、树木茂盛、百兽出没的自然环境，也表现出他们以畜牧和狩猎为主的生产方式，及其由此而产生的文化形态，从而以其独有的价值揭示了游牧社会从野蛮到文明、从氏族部落到阶级社会演化的历史轨迹。在河套鄂尔多斯地区发现的匈奴墓葬中，有大批以各种动物图案和饰纹装饰的青铜饰品及精美的金银饰品，反映了游牧民族对草原生活的赞美和热爱。这些实物遗存，是我们了解原始草原文化特征的有力证据。

由于游牧民族频繁流动和迁徙的原因，保存下来的文献资料极少，有关他们的文化记载在汉文资料中得到反映。公元1世纪，司马迁在《史记》中为匈奴作传，留下了关于草原文化的记述和当时人们对草原社会的认识。《史记·匈奴列传》载：“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驼、驴骡、馱騊、騊駼、騊騊。……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铤。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自君主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这一段记述，形象地勾画出北方草原的社会面貌。

依据实物资料和文献记载，古代草原文化的主要特征是：

1. 围绕游牧狩猎的生产方式，赞美赖以生存的草原和牲畜，以动物形象为主的文化艺术形态。

2. 由于游牧生活的频繁流动，文化积累呈散失性，实物遗留分散；在畏吾儿文字产生之前，北方民族没有留下本民族的文献资料，其历史及神话传说主要靠代代口传。

3. 游牧生活带来开放型的文化心态，容易吸收异族进步文化，其发展趋势表现为从北向南逐步进化、丰富的轨迹。

4. 自然条件恶劣，依天而动，逐水草而居，生产能力低下，难以抗御自然灾害，长期处于原始社会，宇宙崇拜的原始信仰几乎统治精神生活的全部。

5. 人口少、流动性大，社会组织简易，长期没有统一的文字，相对于南方来说，其发展态势处于缓慢停滞的状态。

与北方草原自然地理条件不同的黄河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气候温和，雨水充足，土质松软，又有灌溉之利，便于农耕业的发展。古代民族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因地制宜，围绕着对植物的开发而创造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我们称这种以定居农业为主的文化为农业文化。

农业民族一般都依江河而居，以种植业为主要生产方式。考古发掘证明：远古时代沿江河的农业民族创造的彩陶文化，反映了他们所从事的原始农业之生产、生活方式。彩陶花纹大都以植物为形，如卷状纹、叶状纹等。并开始建筑房舍，用粘土制做灶具。进入文明社会以后，最早见于文献记载的古代民族有关中地区的“华夏”，海岱淮、泗一带的“九夷”等，

“华夏”的炎帝姜族、黄帝姬姓部族的势力向东发展，蚩尤的“九夷”向西发展，先后进入华北平原，炎、黄战胜蚩尤，控制了黄河中下游。在各族征战和融合中，产生并发展了中原文化。商周时，出现了甲骨文字，以青铜制造业为代表的手工业有了进一步发展。因农业生产的需要，铁器的出现和牛耕的广泛使用，至春秋时代由此奠定了封建大厦的基础。其间，原始的粗耕农业逐渐变为精耕农业。社会经济形成了以农业为主的体系，并逐渐形成了黄河流域的两大农业经济区，即以“三河”为中心的华北平原和包括巴蜀在内的关中区域。这些地区一直是古代农业的经济中心，由此也成为古代灿烂文化的发祥地和政治中心。与此同时，在古人的观念中，也形成了“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①的认识，“田野之辟、仓禀之实”作为发展经济、巩固政权的根本大计，在秦汉以前就已被确定下来。在长期发展农耕的基础上，汉民族形成壮大起来，汉文化正是植根于农耕地的一种农业文化。随着历史的演进，以汉文化为代表的农业文化不断发展延伸，成为一种东方文化的典型。《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汉文帝答复老上单于的国书中称：“南方（指黄河流域为中心的汉朝）冠带之室，……使万民耕织，……父子无离，臣主相安。”从中可见与北方游牧社会完全不同的社会面貌及文化形态。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农业文化之基本特性是：

1. 由于定居，文化的发展呈积淀性，秦汉至晚清之文献浩帙，成为东方文明的典型。

2. 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之上的封建文化自成体系，

当某一时期国富力强时，对外来文化兼容并包，出现文化发展高潮，超前或同步于世界各国；当封建统治发生危机时，容易排外封闭，而落后于世界。

3. 自古以来，虽与北方草原文化、南亚次大陆的佛教文化以及其他不同类型的文化进行过颇有深度的交流，但由于自身的文化基础雄厚，始终保持着自身的风格和系统，因而形成具有强大力量的传统文化。

综上所述，由于植根于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从而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文化。我国古代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两大系统，不仅反映了他们赖以存在的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也导致了他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巨大差异。

二、两种文化的对撞、交流及其形式

人类繁衍和生产能力的提高、社会的发展，使不同地域之间的人群接触日益扩大。随着文化传播的增强，在各自的地域边缘就会发生不同文化的对撞与冲击，结果使不同文化在交叉流动中因相互吸收对方的异质文化而不断丰富发展。文化的这种对撞与冲击、交流与融合之现象，首先是基于不同地域人们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北方需要南方的粮食、丝绸、茶叶，南方需要北方的耕畜、战马等。对于游牧社会来讲，由于受生产方式的局限，一般不能生产他们的全部必需品，粮食、衣着、

工具和其他手工业产品主要依靠农业区的供应。因此，经济生活越是扩大，北方对南方的经济依赖就越为突出。南北经济的交流，必然带来文化上的彼此接触，相互兼容或吸收对方的文化也势在必然。

在我国古代，从地理位置上看，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的交界大体位于今河西走廊和河套阴山一带。这一地区又是中原通向西域和漠北的必经之地，向西通过居延海南部进入天山北麓，直至伊犁河流域；向北通过蒙古高原到达贝加尔湖。这一地理位置为两种文化的接触、交流提供了有利条件。在河套鄂尔多斯匈奴墓葬中，发现了丝织品和布帛的残迹，也发现了体现中原风格或中原产物的铜镜和铁剑。这说明，匈奴族很早就和中原的农业民族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两种文化都在互相接触中吸收对方的素养，不断丰富自己和得以不断增大。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即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为了加强军事实力，赵武灵王学习北方民族的尚武习俗，用北方民族的短衫、大裤代替不适于作战的华夏衣裳，学习林胡、楼烦等北方民族的骑马射箭，用轻捷、突击力强的骑兵代替笨重的战车。“胡服骑射”的结果，使赵国的军事力量大为增强。

在我国古代，由于各个时期及历史背景的不同，文化交流的形式也不一。秦汉时期，南北文化的交流大多通过战争的方式进行。秦汉统一国家的建立，伴之以向四周疆域的扩张，首先使匈奴失去了水草丰美的河套草场。楚汉相争之机，“马上行国”的匈奴在其领袖冒顿的率领下，收回了河套牧地，兵锋直指中原，围困汉高帝于平城，其军事力量威胁到汉室的统

治。因此，河套地区及漠南草原成为秦汉与匈奴交战之地。战争引出了汉匈和亲，以及通过赏赐、入贡、赐与、纳岁币、婚嫁、贸易、关市等形式，使彼此的经济文化得到了交流。汉朝流向匈奴的物资有黄金、钱币、锦绣、绮縠、帛絮和粮食等。匈奴放牧的马、牛、羊以及“骡驴、牦驼（骆驼），衔尾入塞”^②，通过河套等地，成群结队进入中原，他们的养马技术也随之传入中原。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之间的战争目的旨在经济的交流和互补，与此同时，两者的文化也得到了交流。汉朝赠匈奴的物资中还有笙、竽、篪篥等乐器，汉室的宫廷文化随之进入草地。匈奴人还从汉人那里学会了计算、筑城、凿井及制造玉玺等技艺。匈奴青铜饰牌中的虎食鹿之动物形象也在汉雕中出现，无疑是草原文化对汉文化影响的结果。汉匈和亲和经济文化的交流，巩固了一统局势，改善了民族关系。“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世世毋得相诈相攻”^③。汉代的文化在南北交流及引进西域文化的过程中，出现了空前的繁荣。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民族大迁徙、文化大交流时期。这时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的接触、对撞又出现了一个新形式——“‘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④，即北方民族主动接受农业文化的形式。

这一时期，由于中原地区经过战争破坏，土地荒芜、人口减少，急需补充劳动力，中原豪族也需要招徕北方游牧民族以充实自己的军事实力，加之在秦汉统一的形势下，北方与中原的联系日益密切，中原地区先进的经济文化吸引着北方民族，致使大批游牧民族迁徙中原定居。当时居于北方的匈奴、乌

桓、羯、氐、羌等族成千上万地进入中原，放弃游牧而定居农耕。《晋书·外戚王恂传》记载，当时太原地方“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内迁到关中的氐羌，也同样“或倥偬于豪右之手，或曲折于奴仆之勤”^⑤，在大地主豪族门下充当田客或服役。这些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后，学汉语习汉籍，很快接受了中原的封建文化。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北魏统治者拓跋鲜卑，他们为寻找水草丰美的草场，克服“山高谷深，九难八阻”，南迁至匈奴故地——漠南草原。他们一反匈奴“抄掠边民”的做法，不仅采取和亲政策，还学习汉族的先进生产技术，发展农业生产，实行“计口授田”和“离散诸部”、“分土定居”的政策，主动解散部落组织，“屯田于河北”，使河套以及云中、代郡之地的农业生产得到了很快发展，中原地区的农耕技术在这里不断得到推广和应用。道武帝拓跋珪和明元帝拓跋嗣亲耕籍田，为百姓作表率。魏孝文帝还下令规定，30岁以下的鲜卑人必须以汉语代替北俗之语，否则“当降爵黜官”^⑥。鲜卑社会在短时期内出现了“南夷荷担，北蠕削迹，廓定田表，混一戎华”^⑦的局面，开创了北方民族统一中原的先河，促进和扩大了南北文化的交流。北魏泰常年间，北凉沮渠氏多次向宋求书，请《周易》及子、集诸书^⑧；北魏崔暹向梁武帝求佛经，蒋少游按照魏王的密令随散骑常侍李彪出使南齐时，专门观察南齐宫殿式样，为北魏修洛阳宫阙作准备，使南方的宫殿艺术由建康而传至洛阳^⑨。北方的乳制品及胡服也在淮河以南流行开来。《晋书·陆玩传》中记载了江南上层士族陆玩到王导家食酪。袴褶即胡服，据《宋书·文九王传》

载：“时内外戒严，普著袴褶”。说明上褶下袴在江南已很普遍。这些北方民族的习俗逐渐成为汉俗的一部分。其他如书法、诗赋等，也随着南北士的来往而得到交流和相互吸收。

另外在当时，不仅我国本土的南北文化得到交流，还由于北方民族的迁徙及河西走廊的畅通，使西域及中亚的文化也相续流入北方。波斯是很早使用铠甲和具装铠的国家。魏晋时期，中亚草原迁徙不定的游牧民族已将铠具从新疆传入中原。马铠的使用见于东汉末年的袁绍军队中，至南北朝时，北方军队已普遍使用。同一时期，键陀罗艺术通过游牧民族由河西走廊向东进入中原，为中国传统艺术所接受。北魏首都代城（北魏386年——493年的都城，今山西大同）遗址中，1970年发现了一件海兽纹八曲银洗，银洗作椭圆形，器形上部和口缘呈八曲形，底部有海兽纹浮雕是萨珊波斯的产品。1983年发现于宁夏固原县境内的北周李贤（曾任瓜州刺史，河州总管）之墓中，随葬的金银器中有中亚传入的鎏金银壶。这都说明，伴随北方游牧民族的迁徙流动带来的东西交通的畅达，使得东、西方文化艺术珍品的交流已很常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迁徙、大融合，不仅对当时汉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为此后唐代形成高度繁荣的汉文化和世界性的交流奠定了基础。

农业文化与草原文化对撞交流的第三种形式是两种文化的同时并存、互相促进。辽、金、西夏时期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即属于这一类型。从唐朝末年开始，随着中原地区的藩镇割据，北部边疆游牧民族的一些部落逐渐强大。辽在松漠地区建国称帝，西夏在河套地区建大夏国，女真也在白山黑水地区兴起，辽